

第一輯 家世 · 足跡 · 貢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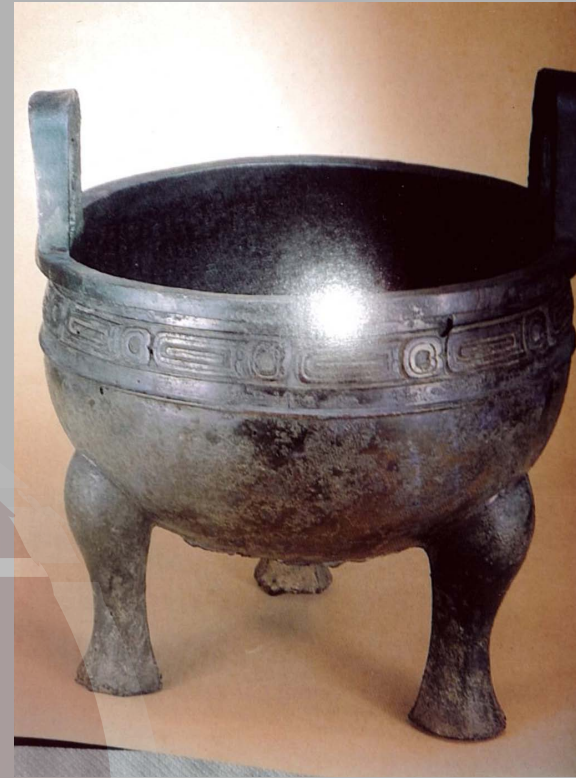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章

抗戰前後時期的貢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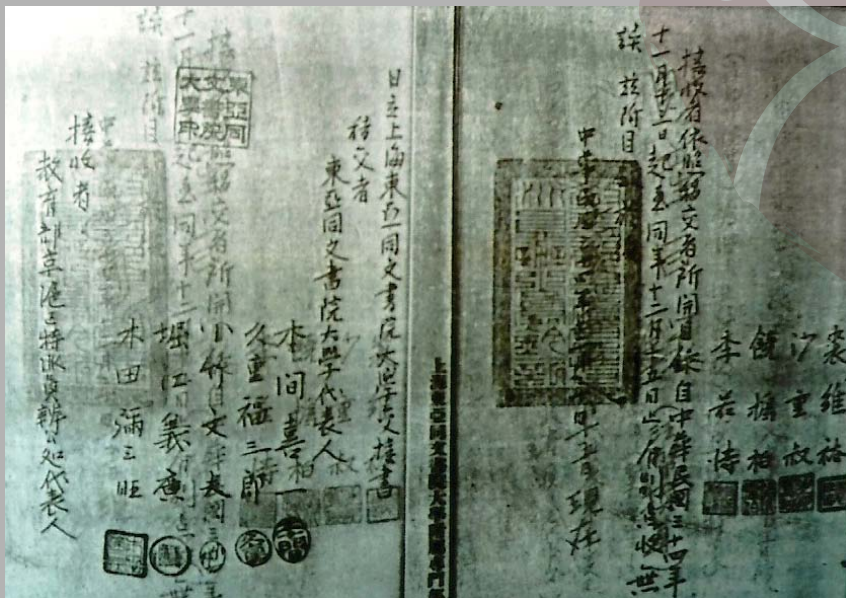




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後，蔣復璁（前排右一）和中央圖書館同仁合攝於南京成賢街舊館。



毛公鼎。(國立故宮博物院提供)



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，蔣復璁出任「教育部京滬區特派員」時，主持接收上海交通大學之交接書憑證。



此玉器為光緒皇帝愛妃陪嫁之精美絕品「翠玉白菜」。(國立故宮博物院提供)

主持文整工程

民國二十四年，父親兼任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常委及舊都（北京）文物整理委員會委員，驗收天壇、文丞相祠等文整工程，並根據政府的《古物保管法》標明古物之種類、標準、範圍，以及制定保存古物相關的法規制度。抗戰勝利前後，父親以中央圖書館為基礎，擴建了省立雲南、蘭州、貴州、西安、瀋陽以及重慶的羅斯福圖書館，且因著父親的圖書館學專長，在館內製定了各項規章制度，創立了中國圖書目錄學新的編目及科學分類法，為將來圖書館管理奠定了相當的基礎，貢獻良多。

出任教育部「京滬區特派員」

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抗戰勝利，父親出任國民政府教育部「京滬區特派員」，兼任華東五省教育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，奉派接收日敵及汪偽政權在南京、上海及華東五省地區所立的文教機構，包括大學、中小學等，並首先以教育部的名義，在上海設立學籍甄審委員會，為淪陷區畢業生進行甄審，補發文憑，幫助他們合法就學並創造就業條件。父親接收了汪偽政府的南京中央大學、漢口的武漢大學，並將兩間大學併入上海交通大學，集三所高校的優秀師資和設備，對壯大交通大學很有貢獻；他也親自接收上海的同濟大學、杭州的浙江大學（前身為「求是書院」），並在過程中接收日本、漢奸的大量圖書，如上海日本的科研機構自然科學研究所、同文書院的日本圖書；南京汪

偽政府考試院長陳群的私人藏書樓「澤存文庫」四十萬冊善本書；另外也接收、整理江浙兩省遭日人破壞的一些民間藏書樓；還將抗戰初期未及搶運至內地的文物兩千餘箱尋獲，並交還給故宮博物院，又從日本追回被劫走的善本圖書十萬冊左右。

父親也曾參與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於抗戰勝利後成立的「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」，實行清理和保護的工作。據「清損會」調查瞭解和部分統計，全國被日本搶奪損毀的書籍、字畫、碑帖、古物等約計有三十六萬一千〇六十四件，又一千八百七十箱，損毀古蹟七百四十一處。經「清損會」艱辛地清整後，日本歸還文物前後有七批一百〇九箱，其中包含遼沈漢墓出土的陶器、玉器及錢幣，現存於國立歷史博物館；歸還的南京大鼎、翡翠屏風則均在國故宮博物院。

毛公鼎的流轉與回歸

毛公鼎兩耳三足，全器通耳高，五十三點八公分，口徑四十七點九公分，於清代中葉道光三十年庚戌（一八五〇年）間，出土於陝西省岐山縣。毛公鼎是西周宣王元年（公元前八百二十七年）鑄造，鑄造者為宣王的叔父毛公盾，距今三千年。鼎腹內壁鑄有三十二行五百字長篇銘文，內容為西周晚期宣王力圖中興之事，為西周青銅器之稀世國寶。毛公鼎內壁的銘文為研究中國上古信史提供珍貴文獻，占有一定學術地位。鼎腹銘文歷經各個著名學者競相鑽研考釋，故全文已讀通，研究者除陳介祺外，尚有徐同柏、吳式芬、吳大澂、孫詒讓、劉心源、王國維、董作賓、高鴻縉等諸家。銘文格調與《藏書·文侯之命》極相似，所以歷來考古學者認為它是「周誥之遺」。

毛公鼎第一個得主為山東濰縣人陳介祺，字壽卿，號盦齋，為清代中葉名臣陳官俊之子。陳介祺三十三歲中進士，官翰林院編修，為當時金石賞件收藏名家。咸豐二年春（一八五二年），陳氏四十歲，從古董商人蘇億年手中以千金購藏毛公鼎，酷愛至極，鑽研後對銘文做了一篇釋文，著有一篇〈毛公鼎題記〉。他還專製兩件偽器，供鄉人借祭，而真品秘不示人。陳介祺於光緒十年（一八八四年）卒，至宣統兩年（一九一〇年），陳氏後代將毛公鼎賣給滿族大臣，直隸兩江總督端方。第二年，辛亥革命爆發，端方在四川被殺，由端方之妾質押給天津華俄道勝銀行；民國十五年前後，質押北平大陸銀行；再由葉公綽、鄭洪年、馮恕三人合資購藏（最後鄭、馮兩位出讓給葉）。葉公綽，號遐庵，廣東番禺人，抗戰前曾任軍政府財政部長、國民政府鐵道部長，擅長書畫、考證兼嗜收藏。民國二十六年抗日戰爭爆發，上海淪陷。葉氏轉赴香港，毛公鼎及其他書畫藏品則全部留置上海家宅，美國人、日本人均擬高價欲收購毛公鼎未成。此時，葉妾潘氏意欲侵吞上海家產，遂而興訟。葉公綽得知後，急電正在昆明西南聯大任教的侄子葉公超，前往上海主持訟事。當葉公超途徑香港時，叔叔葉公綽殷切地叮嚀：「我把毛公鼎交付給你，日後不得用它們變賣、典質，尤其不能讓它出國，有朝一日可以獻給國家。」葉公超抵達上海不久後，未料潘氏竟向日本憲兵隊密告收藏毛公鼎之事，故遭日兵抄家，先是被搜出兩支手槍和一些字畫，後卻因目標轉移至手槍上，未及搜查毛公鼎，故此鼎逃過一劫；葉公超卻因此被誣告問罪而遭日軍逮捕，並接受七次審訊，忍受鞭打水刑，坐牢四十九天。當日兵追問毛公鼎下落時，葉公超表面上雖願意順從日兵交出此鼎，但在暗地裡卻秘囑家人快速地尋找鑄工偽造毛公鼎，藉此以假亂真。而後葉公超順利瞞過日兵，將偽造的毛公鼎交差了事，出獄後，還冒險地將毛公鼎帶往香港奉還其叔。葉氏叔侄均對毛公鼎深入研究考證，尤其葉公超先生的銘搨作雙靴形，與原來器銘相同，其形款條理清晰不紊，成為毛公鼎銘搨公認之範本；同時葉公超還遍請商承祚、于省吾、孫海波、董作賓、唐蘭、容庚、葉公綽考證提記。葉公超一生不但在教育、外交界有卓越貢獻，還對古文化、繪畫、書法造詣極深，其印章、印泥都是親自用硃砂調製，可說是「能者，無所不能」。葉公超晚年出任國立故宮博物院管理委員會常務委員，也有諸多貢獻，葉恭綽、葉公超叔侄兩人，實為保存國寶毛公鼎的大功臣。

民國三十年冬，太平洋戰爭爆發，香港淪陷，葉恭綽又攜毛公鼎復返上海，唯因病中窘迫，乃將毛公鼎押於銀行，繼由鉅商陳詠仁以黃金三百兩借資贖出。陳詠仁因經營五金而致富，成為當年上海進出口鉅商，在抗戰期間，也不免與敵偽人物有商業交往。抗戰勝利前夕，因陳詠仁懼蹈國法，故通過葉、陳共識的友人、前清學務大臣張百熙子張子羽，向顧祝同將軍所領導的第三戰區司令部呈報，有意將毛公鼎自願捐獻國家來將功贖罪。

此事亦為軍統前立法委員王新衡所知，他和戴笠（註二）私通聯絡後，決定放了陳詠仁了事，且由戴笠秘密接收毛公鼎，並未如實向政府報告。陳詠仁當時也通過葉公綽等著名人士，聯名發電報給重慶的蔣中正，表明捐獻毛公鼎意願，蔣中正再將電報批交教育部。當時教育部長朱家驊特派故宮博物院古物館館長徐鴻寶，專程前往上海接收，但因戰事正殷，道路阻梗，徐鴻寶只能繞道飛機到越南河內市，再轉赴上海。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，徐鴻寶還在途中。同年九月，父親奉派出任國民政府「教育部京滬區特派員」，銜命接收南京、上海為主的日敵汪偽文教科學研

究機構時，曾特地追究毛公鼎的下落。在接收過程中，處處受軍統的刁難，有時約好時間卻撲了個空，有時甚至進不了接收單位（因各單位由軍統掌控），即便允許能進入接收，卻也看不見真正要的物品，只是一些無關緊要的東西。因著如此膠著的景況，父親只好向尚未復員的重慶教育部彙報，哀嘆苦經，特別是毛公鼎下落不明，讓父親很憂心。經過父親調查，毛公鼎已被戴笠非法接收，便撰寫報告向上檢舉，當時的教育部長朱家驊瞭解此情況後，則立即指示機要秘書沙孟海擬文告狀至蔣中正。蔣中正獲報後勃然大怒，親筆下手諭勒令戴笠交出這件國寶來，才使他不得不吐出來，大快人心。知情者都為父親冒著生命危險和軍統對立而擔憂，但同時也為父親無私無畏的精神所欽佩。

毛公鼎由陳詠仁捐獻國家的真相大白天下後，受到了國民政府明令嘉獎。經專家鑑定，其花紋銘文及各特徵與收藏家之拓片完全符合，確定是真品。從此毛公鼎歸國家公有，並由國民政府撥繳給於南京中央博物院所保存。民國三十七年冬，毛公鼎等中央博物院文物隨故宮文物一同裝運臺灣，現存於國立故宮博物院並公開展覽，深受海內外民眾稱頌，為鎮院之寶。

舉辦數場國寶展覽會

民國三十五年秋，為慶祝抗戰勝利，父親受命於教育部在南京珠江路地質調查研究所內，舉辦「中華國寶精品展覽會」。這批國寶文物皆是經過抗戰洗禮，輾轉各地，獲神靈保佑才化險為夷，更顯其珍貴。中央政要官員、國內外上層名人均出席開幕典禮，並共同觀賞，對中華文物之精美讚歎不

已；後來中央博物院籌備處（南京中山門旁）大殿也曾舉辦此文物展覽，廣獲好評。另外，國民政府「東北行署」主任熊式輝、副主任張嘉傲，也曾邀訪父親巡視、考察滿清的皇宮（號稱瀋陽故宮），並計畫在東北籌組一座圖書館，同年國民政府頒授父親勝利勳章。

民國三十七年春，父親出任教育部文化宣慰團團長。他籌畫將中央圖書館、北京故宮、南京中央博物院以及上海收藏名家的書畫、瓷器等文物精品，於臺北市省立博物館舉辦文物展覽會。這是臺灣民眾在光復後，首次看到大陸珍貴的歷史文物，見證到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。

註一 戴笠號稱雨農，早年黃埔軍校畢業，曾任國民黨中央軍委會調查統計局局長，從而成為蔣中正身邊情報特務的紅人；抗戰時以軍統局名義和美國情報部門在重慶成立「中美合作所」，除對付日本帝國主義者外，也殘害了無數善良的中國人，故戴笠在民間是殺人魔王的代名詞；其領導的「軍統」特工組織，不但掌控軍隊，還滲透中央和地方警察、稅務、海關、緝私、郵檢、交通、外交、財政、經濟、黨務各個部門，勢力龐大，囂張跋扈，各行業聽見他的名字即聞風喪膽，誰也不敢得罪他。戴笠只聽命於校長蔣中正，另外也用盡任何方法拉攏蔣中正身邊各派系的頭面人物，唯獨文派大員，各個都瞧不起他。